

汪德迈先生教给我们什么

程正民

关于汪德迈先生的专著《中国教给我们什么——在语言、社会与存在方面》，在该书的《序言》（王宁）和《译者前言》（金丝燕）中，都已有全面的、中肯的评论。我从三方面：汪先生跨文化研究的态度，跨文化研究的观念，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谈谈汪德迈先生教给我们什么。

一、跨文化研究的态度

汪德迈先生教给我们，要以诚恳的态度，理解、包容、尊重和热爱别国的文化。人类的文化是多样的、丰富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文化都以自己固有的价值对人类文化做出独特的有益的贡献。对待别国文化，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夜郎自大，要尊重和学习别国的文化。但这种尊重和学习不是一种口号、一句空话，它需要打破文化隔阂，打破语言障碍，这需要付出很大的热情和艰辛的劳动，甚至需要做出一生的努力。这方面许多汉学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汪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文化，从法国到越南，从越南到日本，从日本到中国香港，直到九十多岁高龄还奔波于中国和法国之间，他的一生是为汉学生的一生，当你看到他每年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北京的机场，当你看到他每年站在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的讲台上，你不能不为之感动。

二、跨文化研究的观念

汪德迈先生教给我们，要特别重视他国文化的异质性。他借用福柯的术语“异托邦”来概括他汉学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观念。他在书的“导言”中指出，“要理解中国，与其铭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如去发现中国文化特殊性扎在世界文化共有之土壤中的根基。”他认为研究中国文化要关注的不是那些似是而非的、没有价值的共通点，那些相似性和普遍性，而是那些特殊性、特异性。因为这种特殊性、特异性是“扎在世界文化共有之土壤中的根基”，具有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通真实”。^①汪先生在这里阐明了人类文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是以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各民族的文化就没有什么人类文化、世界文化。只有十分尊重和努力发掘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特异性，才能丰富和发展人类文化。谈到人类文化的特异性，有一个问题往往被忽视，就是我们应当从各民族文化中求什么异，实际上各民族文化中的异有两种异，有正面价值的异，也有负面价值的异。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有仁者爱人的异，有以民为贵的异、有天人合一的异，也有君臣父子的异、怪力乱神的异、“三寸金莲”的异，我们寻求的是具有正面价值的异。一个时期以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成为一种流行的口号，这种口号有正确的一面，就是说只有重视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特异性，才能有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和丰富性。但这种口号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民族文化本身也有两面性，有正面价值的部分，也有负面价值的部分，我们只有努力发掘出民族文化中有正面价值的部分，才能进入世界文化之林，民族文化中具有正面价值的部分才是世界的。

^①〔法〕汪德迈：《中国教给我们什么——在语言、社会与存在方面》，〔法〕金丝燕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第1—2页。

三、跨文化研究的方法

汪德迈先生教给我们文化整体性的观念，教给我们学科研究的整体性方法。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跨学科的研究，而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强调文化的整体性。一个时代的文化也好，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好，都是有区分的统一体，我们既要看到文化的多样性，也要看到文化的整体性，看到各种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汪德迈先生研究汉学，就是把中国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他既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又研究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制度、中国的历史，并十分重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中国文字的特性，他是联系中国古代文化，联系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和占卜来加以认识的，认为中国思想源于中国文字，中国文字的起源为占卜，占卜对中国思想模式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以整体文化观为指导来研究汉学的研究方法，为汉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

重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汪德迈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就我的研究专业文艺学来谈，巴赫金早就指出，“文学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多面的现象，而文艺学过于年轻，所以还很难说文艺学有什么类似‘灵丹妙药’的方法。因此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就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完全必要的，只要这些方法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能揭示出文学现象的某种新东西，有助于对它更加深刻的理解”^①。其中他就指出“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本人就是从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来解读拉伯雷怪诞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特征，从民间狂欢文化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艺术特征的。

谈到汪德迈先生这本专著教给我们什么的时候，我自然想起自己

^①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4卷），白春仁、晓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5—366页。

同法国文化的因缘，想起自由、浪漫的法兰西文学和文论对我的滋润。我是在大学年代接触法国文学的。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许多教授被打成右派分子，结果弄到外国文学教研室无人上课的地步，穆木天教授和彭慧教授夫妇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年轻教师又刚毕业无法上讲台，最后只好请校外专家来讲外国文学，我们也就因祸得福。德国文学请的是冯至先生，英美文学请的是杨周翰先生和赵萝蕤先生，苏联文学请的是叶水夫先生，法国文学请的则是李健吾先生。记得李健吾先生讲的是莫里哀，他一走上讲台，开口一句“当我们走进17世纪的法兰西”就把我们迷倒了。一晃就是几十年，我先是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通过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了解了俄国形式主义，了解了巴赫金，2007年又在巴赫金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见到了托多罗夫，我通过翻译同他交谈，收获不小。第二次同法国文化的来往则是近些年在跨文化研究活动中同汪德迈先生、金丝燕教授这些法国学者相遇，从他们的著作中获得教益。法国文化、法国文学、法国文论教给我许多东西，从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